

SDX & HARVARD-YENCHING ACADEMIC LIBRARY



# 儒学地域化的 近代形态

——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杨念群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99164

1020000  
15

1020000  
15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

儒学地域化的  
近代形态

---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

杨念群著

---



---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杨念群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027-5

I. 儒… II. 杨… III. 儒学 - 哲学史 - 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74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版式设计 彭丹莉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25  
字 数 356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9.90 元

DI90/15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 目 录

<b>导 论：知识群体与作为历史话语的儒学</b> ·····	1
第一节 一个“知识论”问题的设定·····	1
第二节 对整体论认知方法的质疑·····	13
第三节 “知识分子”内涵的歧义性·····	25
第四节 “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古代知识分子的 双重形态·····	35
第五节 儒学地域化与知识群体空间流动的边缘化·····	64
第六节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回响·····	82

## 上 篇 儒学区域话语的类型化分析 ——以知识群体为核心

<b>第一章 区域分野类型：近代知识群体话语的     三重取向</b> ·····	113
第一节 两种话语模式的渊源与湖湘知识分子·····	113
第二节 内倾感应思维类型对岭南地域的影响·····	131
第三节 “微实”与“崇理”之辨：江浙知识话语的 中和效应·····	143

## 第二章 沟通大小传统：政治思维与

湖湘儒学流变·····	160
第一节 政治思维形成的区域背景·····	160
第二节 道统的解构·····	174
第三节 经术与治术：湖湘与江浙的比较·····	189
第四节 帝王之学：外王剥离于内圣·····	197

## 第三章 维新变革之源：岭南神秘主义的

近代意义·····	216
第一节 康有为神秘主义思想的地域渊源·····	216
第二节 神秘主义之果：岭南学人对 “政治神话”的重构·····	231
第三节 佛教神秘主义：《大同书》的逻辑起点·····	249
第四节 岭南“浙宗”余绪与近代“道德决定论”·····	257

## 第四章 道艺如何相贯？江浙地域的学术专门化思潮·····

第一节 江浙知识群体的“谋生取向”·····	269
第二节 “格致”概念与江浙思维传统·····	290
第三节 江浙新思维萌生播衍的双重条件·····	307

## 下 篇 儒学区域话语的功能化体现 ——以书院研究为核心

## 第五章 权力凝聚的象征：湖湘书院与

区域文化霸权·····	347
第一节 先贤崇拜与区域时空观念·····	347

第二节	朱张会讲与岳麓遗风·····	350
第三节	岳麓模式的传承与放大·····	361
第四节	符号资本如何转化为权力·····	372
<b>第六章</b>	<b>理想主义的没落：岭南书院与</b>	
	<b>精英格局之变</b> ·····	391
第一节	书院精英特色的流失·····	391
第二节	书院与社学功能的吻合·····	398
第三节	官学渗透与书院功能的转变·····	402
第四节	考据与官学对峙格局的形成·····	410
<b>第七章</b>	<b>古典偶像的重塑：江浙书院与</b>	
	<b>学风梯级效应</b> ·····	435
第一节	经古之学与科举势力的消长·····	435
第二节	梯级效应与晚清知识群体流动·····	467
第三节	西学与江浙书院课艺网络的形成·····	479
<b>第八章</b>	<b>地域文化的冲突：时务学堂与区际学人之争</b> ·····	504
第一节	理论阐释角度的转变·····	504
第二节	从三大学规比较看时务学堂之争·····	511
第三节	湘粤冲突的地域儒学根源·····	524
	参考书目举要·····	547
	后    记·····	562
	出版后记	

The Modern Models of Regional Confucianism—A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Intellectual Group

Contents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Groups and Confucianism as Historical Discourse

1. An Outstanding Issue
2. Suspicion on the Method of Totality
3. The Meaning of Intellectuals Varies with Different Contexts.
4. The Two Roles of Intellectuals in a Ancient Times
5. Regionalism of Confucianism and Marginal Situation of Floating Intellectuals
6. The Modern Response to Regionalism of Confucianism

Part 1 Analysis on Regional Discourse of Confucianism

Chapter 1 : The Regional Types: Three Patterns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Modern Times

1. Historical Origins of Two Kinds of Discourse and Elites in Hunan Region
2. How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Internal Reaction influenced the Lingnan Scholars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ek Reality (Shi)” and “Seek Principle (Li)”: Reconciliatory Attitude of the Kiangnan Scholars



**Chapter I :Facilitated the interchange between the Big Tradition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Hunan Elites and Political Thought**

1. Regional Background and Styles of Political Thought
2. Disintegration of the “Tao—Tung”
3. “Ching—Shu” and “Zhi—Shu”
4. Learning of Emperor: “Wai—Wang” was divorced from “Nei—Sheng”

**Chapter II :Origins of Reform: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Mysticism in Lingnan Region**

1. Regional Origins of Mysticism in Kangyouwei's Thoughts
2. Mysticism of Buddhism: A Logic Starting of Point of “Da Tong Shu”
3. How the Scholars Restated “Political Myth”
4. Repercussions of “Zhe—Zong” in Lingnan Region and “Moral Determinism” in Modern Times

**Chapter III :How to Link up “Tao” and “Yi”? Professionalization of Kiangnan Academia**

1. The Way of Life of the Kiangnan Scholars
2. “Gezhi” and Academic Traditions in the Kiangnan Academic Community
3. Double Conditions on The Spreading of Kiangnan Academia

**Part 2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of Regional Discourse of Confucianism**

**Chapter IV : Symbolization of Power Concentration :Hunan Academies and Cultural Hegemony at the Regional Level**

1. Ancestor Worship and Regional Ideas about Time and Space

2. Bilateral Talks of "Chu(Xi)—Chang(Shi)" and Yue Lu Academy
3. The Spreading of the Style of Yue Lu Academy
4. How to Transform the Symbolic Capital into the Power

**Chapter VI :The Decline of Idealism: Lingnan Academies and the Changes of Elite Roles**

1. Disappearance of Elite Characteristic in Academies
2. Academies and Shexue
3. Influence of Official Lear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es Roles
4. The Antithesis between Han Learning and Official Learning

**Charter VI :Reconstructed Classical idols:Kiangnan Academies and Style of Study**

1. Ching—hsueh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2. Ching—hsueh and Floating Intellectual Groups in Late Ch'ing Dynasty
3. Western Learning and Kiangnan Academies

**Charter VII :Conflicts of Regional Cultures :Shi Wu—xue tang and Regional Elites**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lanation System
2. A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Major Schools
3. Regional Origin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Hunan and Lingnan Scholars

**Bibliography**

**Postscript**

# 知识群体与作为历史话语的儒学

## 第一节 一个“知识论”问题的设定：

本书关涉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些“知识类型”（the form of knowledge）的内在演化形态及其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仅仅对以往人物的思想材料作历史的程序化处理。这里需首先设定的“知识论”问题是：“知识”的发展是完全吻合于历史真实的演化序列呢？亦或是“知识”本身的发展有可能仅仅在一种自足的相对封闭语境中言述其自性的意义，而与历史的真实序列相疏离？

早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曾经从知识话语叠次更替的角度构设出了一个近代变革的模式。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列举出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由浅入深的递次渐变过程。其中说：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

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sup>[1]</sup>

仔细品味梁启超这段话的表述方式，我们注意到三次变革的递次发生，仿佛首先是某种主观“感觉”的产物。换言之，是某类知识群体主观视角下的修辞策略。由此我们又须设定一个问题：梁启超创设的这个近代变革原型构架作为一种知识语境，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序列吗？或者它仅仅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形构言述方式？统而观之，梁启超的“三阶段论”是围绕三大历史核心事件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依序展示的，每一事件的中心表述话语均具有两个相当突出的特征：（1）它是首尾相续由浅入深的线性展开过程；（2）这个诠释框架具有相当强烈的排拒性，从而形成了三个彼此孤立的“话语丛”，每一个“话语丛”言述的又都是异质的问题。这种叙事逻辑一方面是梁启超等历史当事人人为构筑的，同时又为后来处于非近代历史语境之中的研究者如殷海光等人所承继。

梁启超及其追随者所构设的知识语境实际上关涉着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具体而言乃是一个“社会动员”以及相伴而生的“知识类型”的转换问题。按照卡尔·道易治（Karl Deutsch）的说法，“社会动员”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

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sup>[2]</sup>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进一步解释现代化初期“社会动员”的三个主要特征时说：“其一，大规模的和多种目标的、专门化的（非生态的和非血缘的）群体和组织的兴起；其二，在社会制度的领域中，各种内部市场不断扩展和相互介入；其三，都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普及。”<sup>[3]</sup>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一个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非如梁启超及其追述者所设想的那样，存在一个明显的非此即彼式的线性变迁结构，而是一种交叠互动的网络式演化图景。比如就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而言，不依凭先赋特性的专门人才的自由流动，主要同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政治中的选举和政党活动，以及大多数机构所采用的录用式科层组织方式与机制的交互作用有关，财产和权力也不按先赋的方式来分配，知识分子角色的分化和文化变迁也有可能现代化的共时态中与其他要素重叠发生作用。<sup>[4]</sup>

从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内在机理来说，也并非如梁启超等人所归纳的是一种以“事件”阐释为核心的排它性历史递进过程。从表面上看，近代中国具体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实呈现出了三个层次的内在演进节奏，其递进的幅度分别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示界定出来。与此同时，相关的知识类型界分也以此为背景相嬗相延。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经济领域中的劳动、产品、金融市场的培植和复杂化，以及生产、消费、交换的日益专门化开辟了道路。其中从事“夷务”的封疆大吏所秉有的特定“知识类型”无疑为自强运动繁衍成势创设了思想先机。戊戌维新与新文化运动促成了先赋性的政治群

体愈益疏离王权的控制，并加速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日趋分化与重新整合，最终引起了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然而这种种变革并非是由梁启超等人营造的知识语境所设计的那样，是一种过程彻底完成之后再进入下一个程序的条块分割式的否断路径。因为这三次变革分别指涉的是不同领域中的异质问题；具言之，作为三次变革发动主体的各类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历史中，或准确地说是在“历史话语”（historical discourse）中形成的一种非此即彼的否断式论证，有可能并非是递次进步的表征，或者说这种“表征”仅仅是一种人为语境构造的显现。我们注意到，每次运动的发生都是以某一精英集团操作新型话语的形式展开，其运作又是以否定前一运动之话语预设为前提的。如康梁等维新派的崛起以“制度决定论”的理论形式为其突出表征，但其核心话语的确立却是经过制造大量舆论以否定洋务模式才得以实现的。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曾云：“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sup>[5]</sup>认为洋务之变乃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sup>[6]</sup>而在戊戌维新之后崛起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以否定“制度决定论”话语为其开场前奏。陈独秀明确指出：“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问题的症结在于“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

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惘恍迷离之境。”所以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sup>[7]</sup>

可是问题在于，即使以进步观而非以“间断性”的历史观取向检视这一运作过程，三大运动模式本应具备的话语重叠性仍被忽略了。即是说每一次运动的话语阐释，实际应该包涵着前一层面的合理因素，而且三大变革过程中的话语要素分布应呈现出并列平行的状态，而不应是否断论式的联系。但实际上对前一阶段变革话语的解释权，却操纵于后一阶段变革话语制作者的手中，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了一种否断论式的话语解释链。这个话语解释链大致受到两重因素的支配或影响：（1）对西方进化史观中知识的纪元形式的线型延续（the linear succession of epochal forms of knowledge）观念的无意识接受<sup>[8]</sup>。（2）在现实政治功利语境中对知识构成方式的有意识误读。比如梁启超在对自己曾经参与的湖南变革进行叙述时，有意夸大自身所处之维新群体的话语支配力量。换句话说，三大模式的否断式、直线式的联系线索是自梁启超以来的思想家人为构造的“知识论”语境，又为殷海光、庞朴等人所沿袭，进而成为知识群体不断掀起思想变革运动的模本。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在十年的时间里重演了从经济、制度到文化的近代变革话语过程，可见其历史话语示范力量的强劲。

按否断论式的解释，洋务中兴的失败乃是在于制度创新因素的阙失，而戊戌时期康梁等“制度决定论”者的崛起和受挫，则又使他们认为人对制度的操作取决于一种先天本源的传统力量。于是“国民性”之剖析、“全盘反传统”之提倡成为至今挥之不去的启蒙情结。然而直线式的解释框架到此已意味着其合理性的终结，人们很快发现，把变革仅仅归因于心理的变迁无

异自囿于宿命论的窠臼，因为文化的“本质论”已把人类的变革幅度推至了最难有回旋余地的极端，于是乎人们又重新寻觅制约心理的外在因素的变化可能性，以尝试解释外缘环境变化的影响，至此直线进步的理论就变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论证。

说到否断论式的知识形构过程，我们仍须扣住原有题旨发问：以梁启超三阶段论为代表的知识语境的形成是一种主观的自足现象，还是与真实的历史序列一一吻合？许多证据表明，戊戌时期的政治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只是居于知识形构阶段。它或者没有足够的力量充分进入行为践履程序，或者是原有的设想被转换为别的话语言述形式，而大大疏离初始拟定的实施方案。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所拟定的变政策略就往往为光绪皇帝转型为旧式的“洋务话语”。光绪帝曾下令废除八股，在规定“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式，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之后，又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sup>[9]</sup>这几乎是纯粹的洋务派主张，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光绪皇帝推行的乃是洋务派策略。<sup>[10]</sup>

汤志钧曾于《戊戌变法史》一书中拟有《康有为关于除旧、布新的新政建议表》、《新政“上谕”时间次序表》及《光绪皇帝关于除旧、布新“上谕”分类表》，并据此得出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1898年七月下旬以前），光绪帝主要进行了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的改革，例如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以新法练军，设立京师大学堂，废八股为策论等等。“新政”上谕差不多都是根据康有为的历次上书和“诏定国是”后的专折建议颁布的。从上谕内容来说，对康有为军



事和文教方面的建议，几乎全部采纳；经济方面则厘金未除，军事、文教方面的一些改革，后党也曾提到，如可以重练新军，引进新人，至于关键性的政治上的改革，都迟迟未颁。<sup>[1]</sup>戊戌新政的实际推行状况表明，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尚只是处于一种知识形构的阶段，其预先准备的种种设想，大多没有转型为社会动员的实质过程。而光绪帝遵循已推行多年的洋务策略对维新派话语的有意误用，恰恰证明梁启超否定式的言述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对洋务派的否定可能仅仅具有知识话语的修辞作用，与历史本身的更替序列甚少关联。

当然，就现代化的普适性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面临西方挑战时，确实曾经认同于“现代化”与“西化”相互重叠的历史偶合现象，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近代知识群体演变过程中，确有可能存在一个对西学有所选择的回应频率和节奏，只不过其发生的真实序列不一定是纯粹时间性的，而是更有可能表述为不平衡的空间交错的态势，而且这种表现为空间态势的历史序列与历史话语的型构规则并不完全吻合。换言之，某一知识群体极易在某一时期取得话语支配权，但这与历史话语对历史真实的干预程度，或者说历史真实对话语的显现与吻合程度完全是两个概念，可以分而析之。以往的研究者常常把二者混淆起来，即把“历史真实序列”与“知识形构序列”混同视之。如把康有为提出的某些变革主张与其实际履行的程序不作功能式的区分，这样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落入了历史人物自身构设的言述神话中而不能自拔。从殷海光到庞朴对梁启超“三阶段论”理路不加批判地吸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暂时把“历史言述”与“历史真实”本身剥离开来进行话语分析就显得甚为必要了。